

## 观念、方法与实践

——以《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英国卷》为例

季 进

诚如乐黛云老师所说,如果说《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是“第一波”,《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是“第二波”,那么随着《中外文学交流史》的出版,我国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进入到了“第三波”的崭新阶段(第12页)。从个案分析到宏观著史,从单向探索到双向阐发,这套丛书直观地体现了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共同努力和思路进展,作为长期关注和参与其中的一员,我在倍感兴奋与喜悦之余,自然也会十分关注其中所包含的学术能量,即它究竟为我国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提供了何种启发与可能。这次有幸受邀参与围绕《中外文学交流史》展开的“方法论”笔谈,就此机会,结合我自身的学术和语言背景,主要以葛桂录教授所撰写的《中国-英国卷》(下文简称《中英卷》)为例,分享一下阅读带来的思考。

众所周知,我国的中英文学关系研究延续的是从陈受颐先生、方重先生以来,尤其是钱锺书先生和范存忠先生的传统。钱先生与范先生都是博古通今、融汇中西的大家,他们的著作不仅是历久弥新的经典,更奠定了我国中英文学关系研究偏向实证的取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考证功夫难有匹敌,钱、范二位先生仍然将自己的议题限制在特定时期(17、18世纪)、特定方向(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的研究范畴内,可见要写成一部包罗万象的“交流史”绝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几代学者的学术积淀,以及整个学界的戮力同心。葛教授是中英文学关系研究的专家,在此之前,已经在该领域辛勤耕耘了二十余载,从《雾外的远音》、《他者的眼光》到《中

英文学关系编年史》，已经为一部双向的中英文学关系史搭好了舞台，如今这部《中英卷》可谓是他的集成性著作，其中既有对以往学统的延续，也包含了诸多新的思考和发现。

在导论中，葛教授指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从本质属性而言属于史学范畴，而充分掌握并严肃运用文献是每一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者的基本素养，这提醒我们“资料取胜”始终是“影响研究”诸分支的首要评价标准。《中英卷》在开掘新文献上用力之勤，令人印象深刻，书中引用的大量第一手文献，之前学界鲜有关注，更遑论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与此同时，这些文献并不是任意地罗列或杂乱地堆积，而是体现出某种学术思考。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长时段的研究视野。如葛教授在其详尽的文献综述中指出，我国的中英文学交流研究传统主要聚焦于 17、18 世纪，尤其围绕发生在英国的“中国文化热”展开，以体现中国文学与文化对于英国作家作品乃至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影响。《中英卷》则将观察的时间维度大大拉长，上迄蒙古西征，下至 20 世纪上半叶，而如果不是考虑丛书的篇幅限制，该项研究更是已经延伸至 20 世纪末的全球化时代，这种横跨了几个世纪的宏观视野，显然受益于年鉴学派，尤其是布罗代尔有关“长时段”论述的影响，而对于这些新时代文献的发掘、研究与讨论，便是这本书最直观的特色。20 世纪的文学交流占到了全书一半的篇幅，而无论是托马斯·伯克的“中国城小说”，抑或是中文报刊上的英国作家专号，都在一个总体的历史脉络中找到自身的位置，从一个更加综合的角度，更新了我们对于中英文学交流的某些认识。

二是综合性的文献类型。本套丛书虽然名为《中外文学交流史》，但事实上考察的对象并不仅限于文学文本，更涵盖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等诸多面向的材料。例如在第一章中，我们看到有关蒙古使臣访问英国的历史叙述，罗吉尔·培根的哲学作品《著作全篇》，《马可·波罗游记》，《坎特伯雷故事集》，以曼德维尔为首的各种虚构游记、日记，乔治·普登汉姆的研究性著作《英国诗歌艺术》，马洛的戏剧《帖

木儿大帝》等类型迥然不同的材料是如何共同勾勒出中英文学交流的诞生画面，再比如在对 19 世纪的观察中，传教士的身份被作为中英文学文化交流中特殊的一环予以强调和讨论。这些都显然受惠于学术研究“文化转向”的启示。也由于对一整套文化生产与传播机制保持高度敏感，《中英卷》对于文献载体和研究范式的选择始终能够“与时俱进”，例如在讨论 20 世纪英国文学在中国的情况时，作为新兴的文化生产场域，中文报刊的文学专号、现代的文学流派都被作为重要的研究范畴。

三是双向的文献互证。《中外文学交流史》在整个丛书体例中非常强调“双向交流”的概念，这本应是“影响研究”应有之义，却在具体的操作中往往被偷梁换柱，成为对本国文化输出或异国文化侵入的单向阐释。尽管有人认为将这些不同方向的研究结合起来就能形成某种世界性的图景，然而其中差异明显的研究立场与意图所导致的仅仅是意识形态间的冲突对立。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必须具备跨越边界的立场，这并不是希求一种超然于国别与文化之上的全知立场，而是至少需要获得丹穆若什所说的椭圆形折射中的两个焦点，具体就中英语文学关系研究而言，就是要尽可能充分地掌握两种语言的文献和文化语境。<sup>①</sup>在《中英卷》中，这种跨越不仅仅体现在双向交流的主题上，更体现在利用中英两种文献与文化语境，双向阐释具体的论题，比如讨论王国维与英国文学的姻缘，以及阿瑟·韦理的中国文学翻译，在论证方式上都确实地跨越了单向“影响研究”的视野和藩篱。这当然与葛教授长期的学术积累以及语言能力密不可分，也对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然，站在今天的学术角度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史料的丰富程度与一部史著的优劣对等起来，缺乏必要的文献基础固然无法完成一部优秀的著作，但书写历史也不能仅仅止步于史料的堆积罗列。钱林

<sup>①</sup> 参阅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09 页。

森教授和周宁教授在为《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所作的总序中谦虚地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归于巴斯奈特笔下的“史前恐龙”模式，是在“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中默默耕作，这应当看作是对于树立方法意识、避免随意跟风的提醒，而绝不是倡导学术观念上的因循守旧或自我设限。实证主义史学在其诞生之初风头一时无两，其依托晚近开放的档案文献，以让材料自己说话的高傲姿态，深深震撼了当时的历史学界。然而在经历超过一个世纪的学术更新，尤其经历了来自年鉴史学、新文化史等诸多史学流派的挑战之后，我们不可能还像一百年前的学者那样对之抱持盲目的乐观。法国著名的记忆史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不无讽刺地写道：“在这个被文献科学巧妙地伪装的‘癖好’（下判决的癖好——作者注）里，对文献的屈从，受档案的规训，而实证主义者往往以为那就是全部的历史研究，我们应该看清那其实是将历史建构成由同业团体把持的学科，也是支撑其权威的力量来源”。<sup>①</sup>比较文学学科素来以先锋性与开放性著称，始终以打破各种形式的权威思想和中心主义为己任。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作为“影响研究”的分支，也必须不断寻求更新与完善，才能超越为韦勒克等人所批评的单调阐释模式。因而在《中英卷》的导论中，除了强调文献的重要性，也指出另外两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即问题域和阐释立场。

有关中外文学交流史的“问题意识”，葛教授认为，能否在原典文献史料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由一个个问题构成的有研究价值的不同专题，则成为考量文学关系研究者成熟与否的试金石。在文学关系研究的“问题域”中进一步思考中外文学交流史的整体“史述”框架，展现文学交流的历史经验与历史规律，揭示出可资后人借鉴的发展本民族文学的重要路径，又构成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基本目标。《中英卷》的核心问题有三个方面：中国文学（文化）如何影响了英国文学（文化）的发展和转型？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怎样的？英国文学（文化）

<sup>①</sup> 皮耶·诺哈（Pierre Nora）：《拉维斯的〈法国史〉：对祖国的敬爱》，《记忆所系之处》（第三册），戴丽娟译，台北：行人文化实验室，2012年，第135—136页。

又是如何影响了中国文学（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而这三个问题又对应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三种阐释模式，分别是现代性模式、比较文学形象学模式以及译介学模式，这一特点尤其在与葛教授的前作《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的比较中体现出来，文献不再仅仅只是呈现时间的线索，而是围绕具体的问题发挥作用。在这里，我们既然已经意识到叙述框架的意义，那么自然会进一步做历史编纂学的追问。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再去相信一种标榜纯然客观的普适立场，因为那往往是与中心主义或霸权主义的共谋，在经历了后殖民主义洗礼的当代世界中，中国的中外文学关系以及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持有怎样的立场呢？葛教授认为，那便是“展现着中国问题意识的中国文化立场”，中国文化立场并不是自我封闭，而是“在中国发现历史”，避免沦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东方注脚，为双向的文学关系研究乃至世界文学研究打开新的视野，提供新的理解范式，并与已有的阐释模式展开对话，纠正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的重视。

这套丛书，尤其是《中英卷》，也启示我们重新反思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些问题。首先是现代性阐释模式下暗含的线性逻辑问题，现代性是我们考察 18 世纪以后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重要视点，也确实把握住了这一时期中外文学关系的重点，然而使用现代性阐释模式的过程中，很容易形成一种线性发展的思维模式，而忽略了相当复杂的历史维度和书写可能。这首先体现在对于早期中外文学交流的起源式解读，过于执着地去寻找中国与域外某国文学（文化）交流的起点，并赋予其重要的开端意义，发掘其与 19 世纪后的中外文学关系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印证某种进步性的存在；又或者将前后情形相对比，以获得某种民族的自尊补偿，这些都属于马克·布洛克所说的“起源执念”<sup>①</sup>。无论这样的进步逻辑如何自我伪装，都不可避免地简化了“现代性”一词所包含的复杂性，在这样的视野中，我们将很难看到高彦

<sup>①</sup> 参阅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

颐的《缠足》、叶凯蒂的《海上情爱》或者李欧梵的《上海摩登》这样探讨现代性与文化传统之间关系的历史著作。

这里已经触及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即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文献资料的处理方法。造成历史学界“起源执念”之强势的，正是文献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普及，在我国的中外文学关系以及文学史研究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对于文献近乎“迷信”的心态以及对于研究中文献资料以外部分的轻视心理。我当然不是否认文献资料的基础性地位，或者认为阐释可以替代文献的价值，暂且不论对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大部分议题而言，文献材料几乎难以穷尽，当代的历史研究已然明了：

“档案事实上使得历史学工作者以来档案本身的运作，而这个运作较注重保存，而较不注重应用。而且不论是本质或精神上，档案都不属于历史的好奇，而是属于国家权力。因此，历史学工作者和档案的相遇其实是一个缓慢、偶然、一直有陷阱而且是单向的连接过程”，将文献档案当作毋庸置疑的证据，或者只做字面意思的考证，而无法对其背后的权力机制加以认识，那么只不过是“延续传承而来的记忆”，文献也“仍然是延续性、中央集权化以及正当性的象征，是一种理论上的权利”。<sup>①</sup>因而那种喜爱单纯堆积材料的研究者往往怀揣的某种倨傲心态，只不过是学科权威的滥用，是缺乏自省的体现。在这一方面，《中英卷》从后殖民理论、翻译理论、话语权力等角度，考察了文献材料背后的生产机制，真正达到了一部历史著作而不是一份文献汇编的水准。

综上所述，我国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已经经历近百年的发展，作为我国比较文学专业中历史最悠久、成果最丰富、传统最成熟的领域，在如今我国提倡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国文学理论界谋求国际话语权的大背景下，其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如严绍璁先生所言，新时代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正在经历自身的理论更新与范式拓展，“‘文学关系’

① 皮耶·诺哈（Pierre Nora）：《拉维斯的〈法国史〉：对祖国的敬爱》，《记忆所系之处》（第三册），戴丽娟译，台北：行人文化实验室，2012年，第140、143—144页。

的研究，习惯上经常把它界定在‘传播学’和‘接受学’的层面上考量，三十年来比较文学的研究，特别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事实上已经突破了这样一些层面而推进到了‘发生学’、‘形象学’、‘符号学’、‘阐释学’和‘叙事学’等的层面中”（第13页）。另一方面，尽管《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的主编钱林森先生、周宁先生在总序中使用了“中国中心观”的字眼，但这更多的是对本土话语体系和方法意识，以对抗西方理论中的霸权主义的自觉，其指向的是另一种对话方式或阐释体系，而不是另一种中心主义。“‘平等对话’是一种道德化的学术理想，我们不能为此掩盖历史问题，掩盖中外文学交流上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分析其霸权与压制、他者化与自我他者化、自觉与‘反写’的潜在结构”（第9页），只有通过坚持自身的话语立场，又同时持有开放的心态，我国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才能够真正实现与国际学术界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并且反照我们自身的局限。